

唐宋变革视域下的

中唐文学家传记研究

田恩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唐宋变革视域下的

中唐文学家传记研究

田恩铭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变革视域下的中唐文学家传记研究 / 田恩铭著.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 - 7 - 5161 - 1334 - 9

I. ①唐… II. ①田… III. ①作家—传记—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9968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王兰馨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247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田恩铭君于2005年成为我的博士研究生，他是第三位跟我读书的黑龙江人。在他之前，则有来自黑大的范子晔和任海天，都很出色。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我们师徒之间有着不解之缘。他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傅绍良教授也是跟我攻博，他报考我的博士研究生，他的几位老师如傅绍良、吴言生、刘锋焘教授，都向我推荐了他。可见他在硕士研究生阶段的表现很优秀。攻博士三年，精进不已，我在他的业务鉴定中说：

田恩铭同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治学刻苦认真，学风端正严谨，必修课、选修课都能认真钻研，充分掌握。又撰写多篇学术论文，并在核心期刊发表。已完成的长篇博士论文质量较高，主旨突出，条理清晰，逻辑周延，行文简洁流畅。可以看出：恩铭同学已有较高的科研能力。

关于他的博士论文，2006年夏，他就和我商量，决定以《两〈唐书〉中的中唐文学家传记研究》作为论题，当即开始撰写，至2008年3月完成初稿，几经修改，于5月初打印装订。全文共五章21节，前有引论，结构完整。全文主旨在于将两《唐书》中的文学家传记作分析比较，从而考察中唐、五代、北宋文学史观的演变历程。大致说来，比较充分地论证了两《唐书》的主要区别：《旧唐书》持文学本体观，文学家的创作意义得以体现；《新唐书》则以“道统”规范“文统”，文学家的创作意义被依附于政治立场和道德理念之上，因而文学家的创作成就往往遭到贬低。具体说来，论文值得肯定的地方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

其一，选题视角新颖，注重创新意识。关于这一点，匿名评审的几位专家在评阅意见书中都提到了。将两《唐书》中的中唐文学家传记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得具有研究的可行性。恩铭经过大量的文献阅读，结合古今的研究成

果，找到了切入视角。通过两《唐书》对中唐文学家的传记书写探讨文学史观的具体演变过程。

其二，精研文本，博采文献。“将文学观念的演进与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将文献梳理与文学理论的运用结合起来，将文学创作与传记写法结合起来。”（见该书“引论”部分）既有自己的见解，也吸收古今的研究成果，论从史出，视野宏阔。

其三，面对研究对象，善于将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将综合论述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尤其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例如对两《唐书》韩愈传的研究，通过文本细读，以“史才”、“议论”作为切入点，认为《旧唐书》虽然对韩愈的“史才”和“议论”能力提出质疑，却没有否定韩愈的文学才能；进而又以对《新唐书》韩愈传记文本的“尊韩”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从五代到北宋，正体现了“尊韩”的发展过程。而“尊韩”的表现正是《新唐书》对韩愈“史才”、“议论”肯定的主要原因。

正是基于以上三个方面，我才对他的论文写出如下评语：“卓识时见，新意迭出，是一篇有开拓性的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赵逵夫教授及各位委员也都给予较高评价，全票通过，授予博士学位。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恩铭吸收委员们的意见对论文进行了修改补充，充分吸收了答辩委员们提出的修改意见，质量又有所提高。

恩铭还年轻，对学术研究又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希望他继续努力，勇攀高峰，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做出卓越的贡献。

霍松林

2008年6月于唐音阁

本成果为

中国博士后面上资助项目(20110491681)

黑龙江省青年骨干教师支持计划项目(1251G043)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科研支持项目

目 录

序	霍松林(1)
引论	(1)
一 阐释的有效性与文学图谱的重构	(1)
二 文人传的确立与文学史谱系的生成	(6)
三 “中唐”文学时段的变革意义	(14)
四 中唐文学家传记研究的发展路向	(17)
第一章 儒学复兴背景下的史家身份与文学史观之形成	(25)
第一节 对儒学复兴思潮与古文运动的相关性考察	(25)
第二节 史官撰史与文学家写史的叙事选择	(34)
第三节 宋祁文学观的转变与《新唐书》韩、柳传记的 书写	(45)
第二章 变革中的文学史观与传主选择之标准	(55)
第一节 《旧唐书·文苑传序》与《新唐书·文艺传序》 之比较	(55)
第二节 文人传之传主选择标准与身份定位	(67)
第三节 《新唐书》早期古文家传记中的传承谱系	(86)
第三章 叙述中心的确立与消解	
——元、白传记研究	(104)
第一节 两《唐书》元、白传记书写中的角色意识	(105)
第二节 两《唐书》元、白之文学评价	(118)

第三节 元、白传记中采摭作品入传的考量因素	(131)
第四节 “元和体”与“元白”并称之相关问题辨析	(138)

第四章 书写中心的转移与重构

——韩愈传记研究	(151)
第一节 议论、史才与《旧唐书》韩传中的“问题”意识	(151)
第二节 《新唐书》“崇韩”文本构成要素之分析	(161)
第三节 韩愈“自成一家新语”辨正 ——以两《唐书》韩愈传之论赞为中心	(172)
第四节 《新唐书》采摭韩文人传的主体选择	(183)

第五章 同一人传对象的书写策略选择

——两《唐书》刘、柳传记研究	(189)
第一节 刘、柳的身份定位与文本构成	(189)
第二节 刘、柳文学评价之相关问题	(199)
第三节 《新唐书》采摭柳文人传与唐宋思想的转型	(205)

结束语	(221)
-----------	-------

参考文献	(225)
------------	-------

后记	(235)
----------	-------

引 论

中唐文学是唐代文学史中的一个段落，可是，它会产生超越本时代的变革效果。文学图谱的生成需要一个过程，而当新的元素介入进来，就会形成一次次的重构效果。“中唐文学家传记”被置于唐宋变革的视域下展开研究就必须证明它具有独特的研究理路。选择研究论题势必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可以耕耘的园地，在这片园地里，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属于自己的研究结论。选择史书作为研究文学的操作空间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即史书中的文学家传记本身能否形成一个合理的书写谱系，能否体现出所应具有文学性，传记写作本身提供了多大的研究价值等都是我们要探讨的内容，也是我们所不可避免的问题和难题。

一 阐释的有效性 with 文学图谱的重构

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学史书写总要有有一个标志，学术理念的嬗变导致了文学史书写中的权力转移，格局构建、话语类型、时限断定都应时而变。从开风气上来说，胡适的意义尤为突出。近代以来，随着文学史书写体例的确定，文学图谱的重构就不断地形成了新的叙事格局。从白话与文言的两个谱系的并立到文学史书写的多元格局生成，逐渐打破了以正史《文苑传》叙述体例为中心的书写模式，而胡适《白话文学史》则功不可没。自胡适《白话文学史》出，冯沅君、刘大杰、郑振铎、林庚等人沿着这样的书写理路继续扩展书写视野，尤其郑著《中国俗文学史》全面发掘了俗文学的书写空间，将鼓子词、宝卷、弹词、子弟书等纳入书写视域，而胡氏、郑氏的文学史谱系所建构的精英文化以外的大众书写与传统书写差别何在？现代意义上所形成的重构格局呈现出的书写效果是否可以取代传统的书写方式？传统文学史学在现代研究视域中意义又何在？

胡适截断众流，直接从汉乐府说起，书写了一部白话的文学史，将

“白话”作为文学史衡量文本价值的标准显然与“白话文运动”有着很深的关系。^①在《自序》中他申说自己的《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与“传统的死文学”形成了一种对立的状态。我们不妨先看看胡适对白话的解释：

我从前说过，“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口、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

这样的“白话”定义实际上表述了他自己所理解的文学观念，与“死文学”相比，他将传统文人的文学作品以是否“明白”纳入其书写视域之内，这样作者的身份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他的产品符合设定的标准就可以了，因此，三曹、阮籍、左思、李白、杜甫、王维、韩愈等都进入了白话文学史，并且被排好了各自的坐次，杜甫还获得了专章书写的待遇。这些文学家不再是以整体形象进行全方位的解读，而是将“白话”的一部分作品放大阐释。这带来了一种危险，重一端而忽略其他的独立性解读，似乎这些文学家存在的意义仅在于“此”。“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字被摆在了头等重要的位置，白话文就成为一种非有不可的文学媒介，或者说是“活文学”的源头。问题是这些“白话文学”谱系中的文学家除“此”以外的大量文本被判了死刑，失去了被阐释的机会。本来，文学的传播场应该是在知识阶层和文人阶层各有其传播路径的，一旦以白话为中心则失去了比较的纵深维度。当然，“文学革命”需要的只是直接的有效阐释，而不是文学研究自身所要完成的学术使命。

“白话文学史”首先是“白话”与“文学”的结合。在胡适看来，“白话”必然要经历一个文人化的过程，文体本身也要从民间走出来经历一个士大夫化的过程。汉乐府、叙事诗、佛经的翻译文学、白话诗都要经过文人阶层的过滤才能成为经典文本。这也为文学史图谱的建构增加了难

^① 骆玉明在《关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一文中说：“要说到《白话文学史》的特点，首先要注意到它不是单纯的文学研究著作。它不仅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紧密相关，其背后还牵连着清末以来一系列的社会变革要求。”（参见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导读”部分第2页。）

度，著作权的身份界定被以模糊的方式或者武断的方式加以处置。“白话”与文学的结合就形成了两个解读空间：一个是文学家的白话文学空间，这是一个凸显与遮蔽共存的空间；一个是非文学家的白话文学空间，以民间文本进入文学史的叙述视野必然经历一个被淘汰的过程，落到文字层面上，自然也存在着空间转换的书写视角。

“白话文学”还要形成一个“史”的行进路线，追源溯流之中，胡适对自己的截断众流作出解释，他认为应该从《诗经》写起，因为书写难度以及资料原因而放弃了这一选择。胡适无暇理会文学花园中的种种风景，而是要勾勒出一个大体的文学演进的轨迹。从《国语文学史》到《白话文学史》，其内容设计的严密化就证明了这一点。不过，他仅仅写到“中唐”就结束了叙述的进程。“中唐”正是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段，“中唐”之前的文学还是中国文学史的精英文学时代。从文学精英的“文学史”中发掘出一部“白话文学史”显示了作者的野心和批判力度。基于此，这部文学史的当下意义得到了更为突出的展现，即中唐以前的文学史就是一部白话文学史！撰史者的发现源于文化运动中的一种需要，藉此从传统资源中采摭文本搭好通向现代意义的平台。

白话文学史真的是中国文学史吗？我们不禁发出了一个最为根本性的疑问。古文学需“死”带来的是白话文学要“生”，从民间琐语到主流话语需要这样的阐释理路，当下语言的转换不需要保持文学传统的原生态，只能从中截取材料进入阐释者的维度，让阐释者同时成为立法者即可。他们的任务是通过传统的发掘实现文学革命的任务，让“白话”从私域领地进入公共视域并且掌握绝对的话语权，进而产生思想变革的传播功能。

与胡适相比，郑振铎的书写意图变得非常简单，他并没有文学研究以外的运动指向，而是埋头书写一部民间的俗文学史。他给俗文学下了一个定义：“‘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①从内容上说，他剔除了文人阶层的大量名单，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作品不属于“俗”的范畴，“俗”意味着文学在

①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民间的生产方式与文本构成,以及所形成的相应的传播过程。

郑振铎是古书痴迷者,他以自己的爱好完成了一次文学的民间发掘,建构了一个自足的文学史谱系。郑振铎把书写中心放在组合材料方面,他很少进行长篇大论,而是让作品说话,形成一个连缀而成的书写体系。以时间维度为线索,他有意识地弥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的缺陷,首先,追源溯流,从《诗经》、《楚辞》写起,发掘其中民间的成分。其次,他的俗文学史形成了一个流动的发展过程。胡适《白话文学史》只是将文学史分为两编,以唐代为分野隔为两段,当然这是没有完成的文学史,但是确实没有完整的体系建构。郑振铎则不一样,他下了大工夫,从史料中广泛采摭,以朝代为时间断限,以文体为演进脉络,以民间文本为叙述对象,生成了一部在当时来说另类的文学史。这与郑振铎藏书家的身份有直接关系,他的大量藏品被纳入进来,成为叙述对象。“文学史从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从纯客观的对象性存在演进为主观的价值型存在的过程。”^① 从不被关注的民间存在到进入文学史谱系的大雅之堂,郑振铎担当了发现者的角色。^②

胡适认为白话诗的起源有四个:第一个来源是民歌;第二个来源是打油诗,就是文人用诙谐的口吻互相嘲戏的诗;第三个来源是歌妓;第四个来源是宗教与哲理。^③ 他对佛教做过深入的研究工作,佛教文学也就成为重点书写的内容,许多任务被放在白话文学的队伍中,王梵志、寒山、拾得都成为唐代白话诗的重要人物。这一书写理论一直延伸到现在,被学者演绎成专门的白话诗派。^④ 郑振铎则认为俗文学包括五大类内容:诗歌、小说、戏曲、弹词、鼓词。^⑤ 他的俗文学史并没有将小说、戏曲除外,但是书写中却将之忽略,这大概是为了符合自己为俗文学所下的定义,小说、戏曲的部分作者还是士大夫文人。他也做了一些发掘工作,但不是在经典中寻找样本,而是将民间影响大、传播范围又广的弹词、鼓词、宝卷等引入进来,成为俗文学家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郑著之中也设有“唐

① 陶东风:《文学史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

② 不过,这只是郑振铎的工作内容之一,他还著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文学大纲》等著作,他的大文学史视野从交叉阅读中能够展示出来。

③ 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133页。

④ 项楚等人著有《唐代白话诗派研究》,学习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将唐代佛教文学中的王梵志、庞居士以及禅宗诗歌纳入书写体系,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⑤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4—8页。

代的民间歌赋”一章，王梵志、寒山等人被一带而过，书写重心是敦煌发现的大量相关文本，包括接下来的“变文”一章也采取了同样的写法。郑著的特色是设立了宝卷、弹词、鼓词与子弟书三章，不同身份的民间俗文学在这三种文体中得到了全面呈现。^①当然，这种书写所产生的传播意义能否得到文学史家的承认则很难做出评估，像郑振铎这样的集作家、藏书家、学者于一身的文学史家虽然不少，但是和他一样“眼光向下”的却又不多。

从“白话文学”到“俗文学”不单纯是概念接续的关系，而是研究对象的合法性得到确立的过程。胡适从“古文是何时死的”开始介入话题，革命意味颇浓。郑振铎从“何谓俗文学”出发，亦有开风气的学术野心，他的文学本位阐释使文学史的建构从常识开始，形成了纯粹的文学史叙述空间，在文本的交替流动中演绎着俗文学的新的历史。说它是新的，主要是在这之前很少有学者以如此执着的方式关注“下里巴人”的审美世界。

如果我们以现代的眼光来审视这两部经典文学史著作，则其中必然存在着阐释的有效性问题的悖论。胡适的文学史存在着融合与疏离的悖论，他并没有刻意经营书写一部有明确传承谱系的文学史著作，而是以经世致用为旨归，叙述一个白话的主流世界，这个世界才是未来文学发展的指引方向。“文学革命”过后，当人们再度阅读这部文学史的时候，不再有多少新意，而只是留下一份断断续续的记忆。文学史建构重新进入一个理性化书写的轨道。从新阐释到旧归途，虽然看起来回到了原点，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飞跃，胡适的文学史建构为接下来诸多学者的文学史重构树立了一个标本。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都将胡适的阐释理路合理地融入自身设立的文学史叙述空间之中。如刘大杰在“唐代文学”相关章节中，将“变文”、“王梵志”等内容引入大文学史的格局之中，“白话文学”真正得以入史了。标本虽然走了样，而随后的

^①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叙述唐代文学演进时分为“隋及唐初文学”、“律诗的开始”、“开元天宝时代”、“杜甫”、“韩愈与白居易”、“古文运动”、“传奇文的兴起”、“李商隐与温庭筠”、“词的起来”等章节，虽然也为“变文的出现”设了专节，但是在整个文学史谱系当中，俗文学并没有成为主流（参见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沿袭和纠偏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过程。^①

阐释的当下意义决定了文学史有效性的被认可程度，郑著的影响与胡适比起来，相差甚远。其原因之一就是胡著的开风气意义。而且文学史的撰著者很少把眼光过多地停留在俗文学领域中。学术精英们的解读对象往往是文学经典，而文学经典存在着一个被接受和认可的过程。虽然“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而百年之后真正被认可的还是精英文化，李、杜诗篇虽然不新鲜了，而存在的价值却从来没有被低估过。文学图谱的重构虽然会以新的符合本时代的书写理念作为线索拓展书写空间，却不能回避在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找到吻合的尺度。宇文所安就不确定性问题有过深入的议论，文学文本的著作权归属，文本流传过程中的变异，文学史在时间延续中的接受状况都是重要的影响质素。比如中唐的吴通玄、吴通微、王仲舒，被誉为大手笔的“常、杨”现在都已经远离了文学史的叙述视野，可是，在《旧唐书》中都是文学家传记中的人选人物，对人物自身的善恶褒贬以及文学观念的渐变导致他们失去了原有的位置。大浪淘沙，文学图谱的重构过程使得一切文学史都是当代史？以排坐次的方式所形成的文学谱系是否确定不疑呢？现代人远距离的书写建构能否取代近距离的传统文学史书写呢？

二 文人传的确立与文学史谱系的生成

最先试图打破传统意义上文学史书写格局的是钱基博，他的《中国文学史》起笔就追求文学——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这样一个追源溯流的理性表述。而他所针对的是正史中的《文苑传》：“自范曄《后汉书》创《文苑传》之例，后世诸史因焉，此可谓之文学史乎？然以余所睹记，一代文宗往往不厕于《文苑》之列：如班固、蔡邕、孔融，不入《后汉书文苑传》；潘岳、陆机、陆云、陈寿、孙楚、干宝、习凿齿、王羲之不入《晋书文苑传》……元结、韩愈、张籍、李翱、柳宗元、刘禹锡、杜牧不入《旧唐书文苑传》……然入《文苑传》者，不过第二流以下之文学家尔，且作传之旨在于铺叙履历，其简略者仅以记姓名而已，于文章之

^① 从谢无量、胡适、郑振铎、刘大杰等以个人学养建构的文学史到共和国成立以后由游国恩等人、余冠英等人集体写作的《中国文学史》，再到以章培恒、袁行霈等人领衔建构的文学史著作，正是体现了理性书写的发展轨迹。

兴废得失不赞一辞焉。此所以谓之《文苑传》，而不得谓之文学史也。”^①论断的合理性自然存在，但是并没有从宏观视野上进行考量，钱氏所列举的人物虽然没有出现在《文苑传》里，却同样出现在史传文本之中，况且，《文苑传》也有一套规范的书写方式，只有纯粹的以文闻名者才会进入这个书写空间中来。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相对来说具有科学性和进步性，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史，或者说以《文苑传》为中心的文学图景，则要与史学一脉相承，往往是通过“正史”的传记书写所形成的有序谱系。“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早期，为了勾勒出历史上的文学像来，人们都按老习惯，向史书中去寻找，甚至在写法上也不知不觉地模仿史书的体裁，其中文学史作者常常提起的《文苑传》、辛文房的《唐才子传》等其他传记，都对文学史的写作影响甚深：它们是日后越来越细致逼真的中国文学史取之不尽的细节资源，也或多或少是人们为撰写文学史书设计体例时取法的对象。”^②传统文学史学^③的构成要素是多元的，而不仅仅是《文苑传》，《文苑传》在正史中也不是文学家传记的全景呈现，而只是冰山一角，甚至是浮在水面下边的小角色。他们的文学史观显然是服从于史学观的，他们不会也不能把文学建构成为一个独立的谱系，文学史观正是在史学观念的统治下被有限地呈现出来。于是，要想打破数千年形成的话语书写惯例就需要新思想的介入，随之瓦解了以人物谱系为中心的书写格局，胡适《白话文学史》就是做了这样一项尝试工作，随后郑振铎、刘大杰、林庚等人逐渐创造出了以时空转换、时代变迁、文体演进等为中心书写文学史的新途径。新途径不是凭空而来的，不可缺少的正是当代意识、自我意识的融入，这也是文学史著作中的独著与集体合作区别的标志。而书写意图往往与当下文学观念的张扬密不可分。文学史往往是一代一代学人形成的观念传播史，也是文本解读的累积结果。而文学信息的传播则形成了文本与作者、读者之间的联系网络，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文学观念被确定下来，形成了文学观

①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页。钱氏文学史虽在“文章之兴废”上颇下工夫，而体例方面依然沿袭了《文苑传》之写法，如关于唐代文学的“发凡”，一承《新唐书文艺传序》中的叙述理路，实为扩大的《文苑传》也（参见该书第254页）。

② 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③ 传统文学史学的概念出自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念史的研究路向。

传统文学史学中的史传谱系为我们提供了主流的文学史发生学意义上的研究视点，透过这个视点，时间维度下的文学观念的演进就成为具有动态效果的流动过程。人物的隐显，文本的浮沉，评点话语的转换都见证了活的标本的解剖学价值。不过，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书写形态不同的是，这是以人物谱系构成的一幅一幅的文学史图景，而且，是绝对的精英的文学史，也是主流意义上的文学史。从时代认同来说，这是被处于文化中心地带和政治中心地带共同认可的书写规范。如果剔除帝王意识下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则传统文学史学中通过人物序列建立起的文学图景也有着自身的存在意义。换句话说，站在宏观视野上的史传书写在文学研究中成为一个需要加以观照的透视点。文学研究势必要与史学研究结合起来，透过史传研究发现并解决文学研究中的相关问题也不失为一种选择路径。触动笔者选择这样一个研究题目是因为读了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这本书显然溢出了文学的范围而探讨制度层面、思想层面的转型过程。虽然诸多提法值得商榷^①，却提供了一个切入研究问题，扩大研究视野的视角。中唐虽然是一个关键时段，而他从初唐讲起，“士的转型”被开发出来，初唐文学思想的转型与史书撰写又是密不可分的。正是通过对前代史的刻意书写，新的社会秩序被建构起来，文学秩序也被建立起来。

文学家传记虽然不仅仅是传主的唯一身份，却也是一个重要的身份归属。他们的文学成就让自己的名字传之久远。刘永济说：“虽国史方志之中，有‘儒林’‘文苑’之传，又皆限于时地，局而弗通，不足以考见古人之全，阐发兹事之美。”^②“文苑”作为单一的研究对象根本不能代表时代的文学风貌，也导致了主体文学家的缺席。实际上最为重要的文学家都是文苑缚不住者，他们往往被单独立传，在“列传”之中。如果将“列传”中的文学家与“文苑”中的相结合以考察文学家传记书写与文学观念的关系则不失为具有研究意义的切入点。贞观时期完成了“六朝”为时限的史传书写，时间集中而又理念鲜明，完全可以被确立为一个独立的研

^① 请参考葛兆光《文学史：作为思想史，还是作为思想史的背景——读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文（葛兆光：《古代中国的历史、思想与宗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251页）。

^② 《十四朝文学要略》，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页。

究时段。

虽然有些史书是由两代人完成的，而其当下意义又是不言而喻的。文学的地域特征，文学家的士族身份，文学史建构中的分分合合都是相应的考量因素。朝代更迭注定文学家的身份归属变得模糊起来，而地域特征却呈现出相对恒定的制约条件，南北文化融合虽然也是一个影响要素，而南和北的区域特征则很难被改变，文学家在南则南骚，在北则北风，而士人的自觉或者被迫流动又使得他们将北风与南骚结合起来。

《文苑传》虽然只是一个时代历史脸谱中的侧面，而史传中的文学人物谱系所构成的文学史图景是连续的，也是“断代”的。后人为前代保存的文学景观所具有的吸引力实在有限，尤其在文学批评史上常常是蜻蜓点水的一笔。细想起来，首先存在书写力度的差异。面对不同的传主，从记事、采摭文章、评价话语都会有所差异，这样才能形成从书写中心向外扩散的效果。《史记》因本时代没有形成明确的文学观念，并没有专门的“文苑”，更谈不到特定的书写群体。发愤著“文”或者文之为用成为我们今天确认的文学家传记的书写主题，《汉书》虽然“涛声依旧”却已经开始注意对传主文学身份或者文学才能的话语书写，而且注意在传记文本中著录传主流传的作品。自《后汉书》到《晋书》，“文苑传”的出场逐渐确立了“断代”文学史的书写规范。以初唐为界形成了两种书写范型。^①文学图谱的生成当然是《文苑传》所缚不住的，《文苑传》仅仅是史传之中部分文学家的传记，曹丕《典论论文》、钟嵘《诗品》、刘勰《文心雕龙》……沿着这样的—个书写顺序可以列出难以计数的专门文本。文学的自觉要到魏晋时期才形成，史传之中“文苑传”的出现也相对要晚一些，《史记》、《汉书》中都没有设立专门的文学家传记单元，正史之有“文苑传”自《后汉书》开始。与其他类别的专门传记不同的是，《后汉书·文苑列传》并没有“传序”。能够入选其中的人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有作品传世者，一类是有作品发生影响者。传主均以文章见长，而文本生成中采摭诗文入传、书写“文事”、交代创作状况成为主要内容。如不以主次关系论，《后汉书·文苑列传》

^① 张新科在《唐前史传文学研究》中认为：“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以唐代为分水岭，形成前后不同的两条主流。唐代以前，传记文学的重心是史传文学；唐代以后，传记文学的重心是脱离史书的杂传作品。”（见该书“绪论”第1页。）这是从传记的文学价值而论的，若以传记的文学格局而论，则可以延伸下去。